

# 魏晋南北朝写作理论研究的特点

李道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体系正式构筑时期,这个学科体系从多层次多方位进行构筑,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这个体系的正式确立。本时期的写作研究形成了儒、道、佛互补的理论特点,注意对写作本体的纵深研究,而且从写作研究的本身出发,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术语,形成了与先秦两汉不同的写作理论特色,但有形式的侧重与宗经的偏颇。

## 一、学科体系的正式构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空前繁荣和发达时期,它在我国古代写作理论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说它极为重要,是因为我国古代写作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时期得以正式构筑。不了解此时期的写作理论,对我国古代写作学的基本构架或大致格局就不能全面把握。毫无疑问,后世的隋唐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写作理论与之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已大大地发展、充实和完善了这一时期的写作理论,但是,它们并未全面继承发展这一时期构建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比如关于写作过程中的运思问题、文体分类及各文体的写作方法问题,尤其是从作者的写作过程、读者的接受过程——写作动态流程上研究的特点与方法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说,与后世的写作理论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科体系的构筑,是多方位和多层次的。

从学科大系统的构建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可分为写作过程论、文体论、发展论、价值论、鉴赏论五个子系统。过程论是写作的基本原理,文体论是文体分类及文体写作的特点与要求,发展论是影响历代文章发展的内外因素与规律,价值论是文章效用与写作功能,鉴赏论是读者的接受过程与欣赏评鉴。这五部分实际上已从宏观上构建了古代写作学科研究的整体框架,奠定了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的基本格局。从学科子系统的营建上看,以上五部分的理论阐述都能自成系统。过程论:从写作的准备阶段到构思阶段再到表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写作过程的清晰走向,这种过程走向并不是搜集各家的一言半语拼凑剪裁起来的,而是一些论著本身的自然走向,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写作过程论部分即是如此。文体论:从文体名称的诠释到文体源流的梳理,从文体风格的把握到代表性作品的分析,再到各体文章写作要点的归纳,文体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笼络其中。发展论:既有文体演变的阐述,又有语言趋向的评判,更有影响历代文章写作的诸种因素的综合探讨,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历代文章写作的特点及制约文章写作的内外因素。价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能从实用、认识、审美三方面阐发文章的效用与写作价值,把先秦两汉的文章功用观发展得更为具体、明晰与系统,而直至清代,这方面的理论阐述从总的方面并未越此范围。鉴赏

论:这部分的内容虽然不很多,但能把作者与读者联系起来,把读者的接受鉴赏活动纳入写作的整个系统中去考察,以此作为沟通写作的循环流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确实难能可贵;而且鉴赏论中对鉴赏的态度、层次与方法也作了较为系统性的论述。假如我们再往下分,还可从子系统中分出许多亚子系统。比如过程论中准备阶段的主体素养与动机触发,构思阶段中想象的特点、灵感的情状,表现阶段中章句的安排、修辞手法,都能自成系统;再如文体论中对诸种文章源流因变的考察,即可看作一部文体小史。假如我们再从这些亚子系统往上回升,作左右的横观了望,就可看到它们是自成系统又互成系统的,既条分缕析,又联络沟通,最终构成了一个学科研究的大系统。

由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不仅从宏观上构建了学科的研究体系,而且从中观和微观上,从各个环节、局部子系统的营建上,有许多方面已构筑得相当充实并趋完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具有如此整饬有序的系统性,是这一时期写作研究的专论、专著系统性的集中表现。比起先秦两汉写作研究的片言只语,魏晋南北朝数量较多的单篇论文已把一些理论问题大大地系统化了。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篇有关写作价值、作者个性、文体风格、鉴赏态度的综合性论文;陆机《文赋》是一篇系统性很强的写作过程论;葛洪《抱朴子·钧世》是一篇很有逻辑性的文章发展论。但这时期的写作理论家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对某方面理论进行全面、详细、深入的研究,他们开始用专著来构筑自己的理论系统。比如对各体文章的源流、特征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单篇论文显然容纳不下其丰富的内容,于是便有了挚虞、李充编撰的文体专著《文章流别集》、《翰林论》(可惜两书已散佚)。这是对某方面理论探讨的专著,而刘勰的要求更高,他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全方位、多侧面探讨写作理论的宏篇巨制。他在《序志》篇中认为,单篇论文和某方面的理论专著虽然可以阐发对某种理论问题独到的深入的见解,但不能把写作中各方面的理论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他认为“詮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但他知难而上,“按警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烛照写作的方方面面。他自信地说:写作中各方面的理论问题,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亦几备矣”。唯其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才对后世的写作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明清),人们对其体制的宏伟和理论的精深称羨不已,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文心》体大而思精”,“笼罩群言”。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之为“龙学”,这在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理论研究领域,是绝无仅有的。的确,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 二、本体研究的纵深挺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研究能够如此迅猛地构建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且许多方面的探讨又如此深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精神气候与学术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这里的思想解放,是主要针对汉以来的“独尊儒术”而言的。“魏之初霸,术兼名法。”<sup>①</sup>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在汉末曹魏时期便受到削弱。随着汉王朝的瓦解,阶级斗争的激烈和绵延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已变得格格不入,痛苦、失望成为当时最鲜明的社会情绪。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消解苦闷,便在老庄著作中寻求解脱,一时注《老》注《庄》成风,并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哲学经典《周易》,于是谈玄之风炽甚,寻虚讲微在文人士大夫中成为普遍风尚。另外,东汉时传入的佛教也在这时期找到了适宜的精神气候而大为兴盛,佛教的空无思想与玄学的崇无思想有其相通之处,清谈家们时常从佛学中汲取一些理论以发挥玄学。这样,玄学便成了一个以道为主,又杂糅儒、佛的精神综合体。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持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总有三种小玩艺,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释。”<sup>②</sup>玄学的兴盛对文章写作有其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给人反抗现实、傲诞礼法、思想解放以积极影响;从消极方面看,容易把人引入脱离现实、追求神仙怪异的轨道。但是,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对宇宙本体、生命本质、言意关系的深沉思考,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精神视野,提高了人的理性思维水平。写作研究作为对

写作主体精神现象的探讨，受玄学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此便产生了不同先秦两汉的理论特色。

首先是在写作研究中，开辟了儒、道、佛互补的理论特色（此为后世所发扬光大）。这种理论特色在陆机的《文赋》中已有所表露，如“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便是道家虚无思想在写作理论中的移位变通。到了刘勰《文心雕龙》，这种理论特色已表露得十分明显。如“大判条例，圆鉴区域”，显然是佛家术语；“虚静养气”的观点无疑来自道家守气养生的理论；而所谓“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则直接来自《庄子》一书；在《文心雕龙》中，反映出哲学思想上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哲学经典《周易》，比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气有“刚柔”等在《周易》中都可找到出处。当然，刘勰并非寻章摘句之徒，他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是经过消化吸收后而化入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正如他在《序志》中所言：“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有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有不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所谓“折衷”，不是调和，而是求至当、正确。正因为刘勰有这种兼收并蓄、改造消化的气概与力量，才使他在写作研究中能取众家之长而弃各家之短，自立一家。比如他用儒家的明道思想来反对形式主义文风，而在论述写作过程时，又借鉴道家关于精神的“独往独来”的观点阐释写作的思维情状，移用佛家的“像教”观论述形象的产生，如“神与象通”，“窥意象而运斤”的理论即可作如是观。

二是新的理论术语的创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不仅从玄学中移植了一些理论术语，如“本”、“末”、“有”、“无”、“体”、“用”等等，而且还能从写作研究的本身出发，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术语。新术语的产生，并非仅仅表现为新的对象的发现与认识，更标志着理论的突破与观念的更新。如果新的理论术语能够调控新的理论内容，那么，一个新的理论系统也就产生了。魏晋南北朝的写作研究要在先秦两汉相当薄弱的理论基础大幅度地开拓发展，以往的理论术语便远远不够，于是，一些新的理论术语如“风骨”、“神思”、“应感”、“体势”、“熔裁”、“滋味”、“才气”、“情性”等便产生了。这些新术语的产生实则标志着新的理论内容的创立。比如，“风骨”是要求在思想感情与言辞表达方面树立一种健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章写作的基本规范；“神思”是想象情状的描述与概括；“滋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诗歌美学特征的把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大量的新的理论术语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概念的系统，它极大地帮助了刘勰理论的铺展与阐述。

三是观澜溯源、本末并重。魏晋玄学解释《老》、《庄》，特别注意探讨宇宙的本质，从宇宙万物的“有”追溯其最初原始的“无”。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sup>③</sup>“无”为“有”之本，“有”依“无”而生，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即是“无”。这样，玄学便摆脱了具体事物的形色声名的纠缠，而从事物的本——“无”上抓住了万物共同的本质，增强了理论的涵括力。玄学无疑是老庄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但它以无为本，依有寻无、崇本举末的思想和方法对写作理论研究向本体的纵深挺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先秦两汉，写作研究主要是停留在可以直察到的写作的外部特征与规律的讨论上，而魏晋南北朝则能由外入内，观澜溯源，探讨写作的发生过程与思维情状，这样就抓住了写作的内部特征与规律。比如，想象、灵感作为构思活动中十分突出的思想情状，很能说明写作的精神特征，然而，想象、灵感作为隐秘的大脑思维活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能把理论的触角伸入这种精神的隐秘地带，以明确的语言描绘其特点与规律，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较之先秦两汉，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理论系统的构建与阐述上，这时期的写作研究移入并充分发挥了玄学的本末说。曹丕认为“文本同而未异”，即认识到了写作的基本原理相同而文体特征不同。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之加以充分发挥，从《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上说，过程论属“本同”，文体论属“未异”；在文体论中，源为本，流为末，所谓“原始以表末”；具体到文章写作，情理内容是本，文辞形式是末，所谓“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在文章形式中，整体结构是本，具体语句是末，所谓“振本而未从，知一而万毕”。但刘勰不象玄学家重本轻末，而是在重本的前提下，也重末，以本振末，本末兼俱，从而体现出他的理论系统的本末相生、环环相扣的构造特色。与这种构造特色相联系，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具体篇章的安排和论述上，既注意突出该篇章论述的重点，又注意与其它篇章内容上的血肉联系，避免作机械的切割与孤立的论证。例如《体性》集中讲风格，《风骨》则着重讲为文的健康的基本风格，《定性》再讲风格的形成过程，篇章之间勾前连后，表现为一种连

续演进的功能。与之相应,刘勰在论述具体问题时既注意矛盾的普遍联系,又善于提取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定势》中,刘勰讲写作主体要学会综合运用各种体势,“奇正相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但兼解俱通又要防止“雅郑共篇”,“两难俱售”;刘勰要求各种文体写作“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但必须注意“以本采为地”,即不要失去某种文体应有的基本风格。在刘勰的理论阐述中,到处充满了这种矛盾的辩证法精神。

四是人的发现与个性的张扬。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带来了社会上品评人物的风气,而魏晋玄学更以品评人物为一大乐趣。玄学品评人物往往是以道家的自由人格精神为标尺,以虚静、玄超为人物的精神境界,重人物的才性气质、独特的精神个性。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发现,由人的发现又促进了对人个性的张扬。反映在写作理论上,便是对作为写作主体的人的关注,重视作者先天的才能与气质,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写作上才能的偏至,主体个性精神与文章风格的自然联系。一句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把主体置于写作研究的重心来考察,强调主体的能动性 with 创造性。比如,刘勰在《原道》中认为,天地人“三才”中人是“性灵所钟”,“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而文章是人精神创造的产物,“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由于对人的重视,人的创造活动便自然成了理论研究中关注的焦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史上独占鳌头,其思想原因便在于此。与之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还表现了这样一个特点:以人设喻。比如这时期出现的一些理论术语如“风骨”、“体性”、“气韵”等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理论术语;再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即是以人体衣着为喻来说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种人化的理论特色对后世影响相当大。以人设喻,既说明了对文章写作生气灌注的人化要求,也是把文章当作人的创造活动的一种精神反观。

### 三、面向实践的理论趋赴

魏晋南北朝的写作理论虽然受当时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的影响相当大,但它并未成为哲学的翻板,而是从写作学的角度予以消化吸收。这与先秦两汉的写作理论成为政治、道德、哲学理论的演绎极为不同。先秦两汉的写作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些写作的基本原则,但从与写作情状的弥合、指导为文实践的方面说,毕竟显得隔膜。魏晋南北朝的写作理论不仅有理论的形而上的纵深开拓,而且还能联系写作的具体实际,对写作实践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虽然这种针对性和指导性较之后世还不很充分,但这种面向实践的理论趋赴却是中国古代写作研究中务实精神的良好开端。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是写作研究的本体意识。陆机作《文赋》的目的十分清楚:“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知道写作中的复杂情状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但他决心倾其所能,把自己把握到的写作奥秘说出来。他说:“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刘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序志》中也说得十分清楚:“言为文之用心。”刘勰是个宗经论者,为了成一家之言,他避开对经典的诠释而自觉地从事写作研究,把心血倾注在《文心雕龙》的写作上,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在《序志》篇的《赞》中说:“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正因为陆机、刘勰等人有这种强烈的写作研究的本体意识,经过他们的巨大努力,才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摆脱了两汉对经学的依附而避免成为政治、伦理、哲学的演绎,从而也就体现为一种纯正本色的写作理论。

二是注重他人和自我经验的总结。陆机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他在《文赋》的序中说:“余每观才士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显然,陆机是在阅读了大量的他人的优秀文章,用心琢磨其中的文理,而后又结合自己的写作体会来作《文赋》的。如果只谈自己的写作经验,可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而把他人的经验与自己的经验互相比较印证,交汇融合,那么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有了普遍性,对写作实践就会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当今学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分析指出,陆机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与“开篇二语呼应,以己事印体他心,乃全《赋》眼目所在。盖此文自道甘苦,故于抽思呕心,琢词断髡,最能状难见之情,写无人之态,所谓‘得其用心’,‘自见其情’也。”实际上,象陆机这样用心窥测他人文章的文理而结合自己的写作体会来研究写作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

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与历史趋势。如此时期范晔、沈约对声律的发现即是如此。

三是加强理论的实用性。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但他并不因构建恢宏的理论体系而忽视写作的具体操作应用性的研究。相反，他十分注意具体细节的技术性的研究，避免理论上大而空的抽象说教。比如他在研究谋篇时指出要提纲挈领，注意整体骨架的端正，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而在研究具体行文时又要求注意局部的完美，不然就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再如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各种文体写作要点的把握，都注意到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他多次强调对初学写作者的引导，注意范文的选择和体裁特征的把握，更能见出其理论的实践趋向。刘勰如此，颜之推亦如此，他把文章写作纳入《家训》，作为训子的一大内容，可见其引导的良苦用心。

四是批判当时的不良文风。这一点十分明显，这时期许多研究写作的文章和专著就是针对当时的不良文风而发的，它已成为当时许多研究者的一大动机和撰写目的。比如钟嵘《诗品》之产生，就是“疾其淆乱”，于是他要用《诗品》来“辨彰清浊，掇摭利病”，以“定优劣”<sup>④</sup>。显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补偏救弊，把文章写作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此，一些人注意理论的有破有立，在批判某种倾向的同时，注意保留其中的合理因素。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一方面批判“随华习侈”的文风，另一方面又不否定文采的重要，而是对其加以仔细的研究，树立正确的标准。这种有破有立的理论阐述，比起汉代杨雄的全盘否定，更能贴近写作的实际。

#### 四、形式的侧重与宗经的偏颇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研究表现出了理性思维的品格，不过，这种理性品格并不是充分的，思维的内容与表述的形式并未得到理想的统一。纵观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论述采用形象性，而这种形象论述的特征在魏晋南北朝尤为突出。这时期的两部最为杰出的论著《文赋》、《文心雕龙》是采用赋体和骈体来描述理论成果的，这种文学的体裁形式固然加强了理论的生动感和形象性，但是，这种体裁的形式多少限制了表述的自由和理论的清晰。用整饬和两两相对的语言形式来表述精深的理论内容，陆机和刘勰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即使陆机和刘勰语言才华超群，但互文见义、前后对仗的语体要求必然会逼迫他们把一些完整的概念和思想砸碎，分别镶嵌在形式的花边里。这样，一些生气十足的理论观点在强行切割后变得飘忽不定。再者，赋体、骈体所要求的形象特征也会削减理论的力度，过多的形象描述和比喻堆积会遮掩理论的朴素面目和直率品格。比如，刘勰多次用良匠制器来比喻写作这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把技术与艺术等量齐观，就不恰当（在古人那里，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再如“风骨”这种形象性很强的理论术语要真正把握其内涵并不容易。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尽管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术语，以此铺展自己的理论轨道，但由于许多理论术语产生于比喻的层面，再加上骈体文的形象发挥和形式镶嵌，由此也带来了一些理论术语概念内涵的不稳定性和多义性。比如《文心雕龙》经常使用“体”的概念，但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既指文体，又指风格，既指身体，还指体察，许多时候，我们只有通读全篇，才能确定其具体所指。这又涉及另一问题，这种语体特色和形象论述也造成了人们阅读理解的困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式主义文风日益猖獗，“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sup>⑤</sup>生活在这时期的写作研究者显然未能挣脱这种风气的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陆机、刘勰，他们一方面批判形式主义的文风，一方面又用十分华丽的语言来表达批判的内容，这无疑构成了内容与形式的反差。陆机批判“辞漂浮而不归”、“嘈囋妖冶”的文气，主张辞意双美，提倡“会意尚巧”、“遗言贵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客观上助长了日趋膨胀的形式主义文风；刘勰主张先情后文，质文并重而又以内容为本，但在有些篇章中，又过于重视形式美，如他在《丽辞》中说对偶是文章写作的必然现象，犹如人的“支体必双”，在《事类》中认为古事成辞，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就是把形式美强调得过了头。

与先秦两汉比较，这时期写作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忽视写作主体的品德修养，过于强调作者的才气；与后世比，又轻视主体的人生阅历、社会生活对写作的影响；虽然这两个问题在这时期的写作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比重太小太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多数为贵族阶层，他们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不关世事，故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相形于先秦两汉;在文章写作的思想内容要求方面有个极大的进步,就是重情,公开标明情感是写作的动力与内容。萧纲在给儿子的信中甚至这样要求:“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sup>⑥</sup>“放荡”并非指作艳语淫文,而主要是指写作中要放开手脚,抒情写性,罢去拘束。显然,对情感的极度强调无疑促进了文章写作的解放。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写作实践中情感的泛滥与虚伪,为文造情、华而不实是当时文坛的两大流弊。为反拨这种不正之风,挚虞、刘勰、颜之推等人主张用宗经来救治。刘勰在《宗经》中所提的“六义”就是针对内容与形式上的这两种流弊的,他企图以经文为典范,建立一套正确的思想艺术的标准。但为了宗经,他不恰当地夸大了经文的语言特色,曲解《诗经》的思想内容,把一切文体都纳入经文的范围来考察,对一切不合经典的思想艺术特征的作品加以指责批评。如他批评楚辞的诡异之词、诡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音四者,不合经典;批评诸子文章中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为舛谬杂乱的东西;把汉魏六朝乐府中的情歌一概斥之为郑卫之音。这些偏狭与保守的观点显然是宗经所带来的局限,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刘勰在写作研究上应当取得的更大成就。

#### 注 释:

- ①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② 鲁迅:《准风月谈·吃教》  
③ 王弼:《老子·四十章注》

- ④⑤ 钟嵘:《诗品序》  
⑥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责任编辑 张炳焯)

#### (上接第21页)

在社会历史观上,他提出“合力论”,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实践活动,把整个社会现象划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说,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一个以物质作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诸因素的统一。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论论、认识论、历史观和逻辑学是统一的。所以,恩格斯强调哲学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本体论,就是它的社会存在论,但不同于卢卡奇的社会存在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论是以实践为核心或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但这个物质本体论不是指人与自在自然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为了处理好自为自然和自在自然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自为自然就不断的扩张,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认为,要以相关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是由人与自为自然及其相关关系三方面的因素相关性的统一,不能以其中的一项去把握它,因而它的物质性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而是与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物质自然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人的思维的电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还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博士生倪素香认为,在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时,既要注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又要注意本质与本原的统一。作为社会存在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作为社会存在本质与本原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生产实践。

郑文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的社会本体看成实物性的社会存在或关系性的活动(如劳动、实践等等),前者其实只是人的对象化的产物,后者是人对象化过程的途径,均不能构成终极性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础,从而也就不能成为本体。马克思说过,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人。应该说人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责任编辑 严 真)